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①

陈立人

(湖南工业大学 师院校区,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广州和武昌农讲所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亲密合作的结果。农讲所的成功创办,导源于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策略,有赖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得益于两党领袖人物的实地支持。其教育教学由两党干部共同参与,学员的选送和安排由两党合作承担。农讲所成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终于两党分道扬镳,反映了两者的阶级关系和不同政纲。

关键词: 农讲所;共产国际;国共合作;阶级关系;政纲分歧

中图分类号: K2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6-0064-05

Lecturing Institutions of Peasant Movement and the First Cooperation between CCP and KMT

CHEN Liren

(Teacher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lecturing institutions of peasant movements in Guangzhou and Wuchang cities are not only one of the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during the period of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but also the outcome of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CCP and Kuo Ming Tang (KMT).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lecturing institutions of peasant movements derived from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oriental strategy, and rested with Sun Yat Sen's "assisting peasants and workers" policy, and benefited from full supports of leaderships of both parties.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s participated by both parties' cadres, and the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students is shouldered by both parties, too. Lecturing institutions of peasant movements started with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CCP and KMT and ended with final breaku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hich reflects the discrepancy of class relationship and political platform of both parties.

Key words: Lecturing Institutions of Peasant Movemen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CP and KMT Cooperation; Class Relationship; Discrepancy of Political Platforms

自1924年7月到1927年6月18日,广州农讲所(共6期)、武昌农讲所(1期),共毕业学员1 600多名。加上在广州农讲所带动下各省创办的农讲所(班)达40多个,造就了大量的农运干部,大面积地动员和提升了中国农村民主革命的人力资源。

广州和武昌农讲所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中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亲密合作的结果。作为国共两党大革命时期的伟大创举,离不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国内国际历史背景,离不开共产国际东方革命策略的指导。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始终看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与分歧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① 收稿日期: 2010-07-10

作者简介: 陈立人(1948-),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地域文化研究。

对于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合作以振兴中华民族,造福人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农讲所的创办导源于共产国际东方革命策略

从世界范围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奋起斗争,帝国主义列强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联盟的反革命旗帜下,联合起来企图颠覆苏俄,扑灭已成燎原之势的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则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对抗各国反革命联盟。面对此,第三国际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国共合作和推动两党重视农民革命。早在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即主持制定了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当与中国的革命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1]促成中共中央放弃了“一大”确定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政策;1923年6月,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中共“三大”和其后的国民党“一大”所采纳。1922年11~12月,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指示,要求中共把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放在首位。指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必须“采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2]161-163}“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3]同时,共产国际执委又对国民党提出了基本要求: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2]263}

这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纲领。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和陈炯明叛变,对孙中山打击沉重。1923年初,孙中山借助滇系、桂系、粤系的力量,驱逐了陈炯明,在广东第三次建立了革命政权。但中国国民党是1919年10月由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而来,仍然没有明确具体的革命政纲,成分复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必需改造国民党并刷新党的纲领,寻找新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创立初期,仅党员420人,尚处于探索道路阶段。年轻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缺乏深刻的分析,以为只要学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在大城市举行大

罢工,再从局部罢工发展到全国工人大罢工,就能推翻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但在北洋军阀残酷地镇压下,工人运动从高潮转入低潮。总之,国内外的形势要求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心进一步支持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需在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和打倒北洋军阀的同时,实现国共合作,并致力农民革命。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工作部部长的林祖涵(林伯渠)和秘书彭湃,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组建广东省农民协会,创办以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为目的农讲所的议案能很快获准,与共产国际推动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面向农民和农民运动坚定的态度息息相关。

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苏联给了中国人民无私的援助,其中包括向中国革命阵营派遣军事顾问和资助经费。鲍罗廷、加伦、马也夫、弗朗克就先后担任过广州农讲所的教员。1927年6月下旬,汪精卫集团急剧右转,公开发出压迫工农运动的通告和训令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给武汉政府200万卢布,以期挽留汪精卫集团。令人遗憾的是,斯大林的迁就妥协和鲍罗廷要求中共收束工农运动的策略,没能使汪精卫集团回心转意,但也足证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关注程度。

二 农讲所的创办有赖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

对农民力量的尊重,陈独秀不及孙中山。中共创立以来,陈独秀不重视农民运动,建党初期长时间没有较为明确的农民革命政策,他主持的中共“三大”忽略了农民,在吸收党员上仍没有提及农民。甚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农运之伟力已为人所共见,陈独秀仍然放弃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但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的过程中,对彭湃着手农民运动持支持的态度。毛泽东曾在为中共三大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后发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4]由此可见,较之于当时陈独秀、张国焘,国民党对农民力量的推动反而颇具成效。1924年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扶助农民放在第一位,在国民党

中央设立了农民部,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第一任秘书,罗绮园、阮啸仙(中共)出任农民部组织员。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彭湃协助部长林伯渠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旋即为孙中山批准并颁令切实贯彻执行。林伯渠以农民部名义提出创办农讲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亦获孙中山批准。以上,均为农讲所大规模地公开、连续、规范举办,为两党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合法依据。

国民党对农讲所的支持还体现在:一是农讲所以国民党的名义举办,其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二是农讲所实际主持人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聘请,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讨论通过,如毛泽东担任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兼国民党广州农讲所主任,即是由汪精卫等主持中央党部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的;^[5]三是农讲所的经费场地亦由国民政府拨给,如第六届农讲所之办学经费7 980元,由“中央设法拨给”;^[6]四是农讲所的场地设施由广东国民政府提供:第一届、第二届所址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广州越秀南路53号惠州会馆,现越秀南路93号),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所址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内(原反动商团头目陈恭受的别墅,现为东皋大道礼兴街6号),第六届所址在番禺学宫(今广州市中山四路42号该所旧址纪念馆)。

这里附带指出,在广州农讲所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相继开办的如汕头农工运动讲习所、琼崖农民自卫队训练所、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漳州农工运动讲习所和工农政治讲习班、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等40多个农讲所和农训班,虽多为共产党人或革命民主人士实际运作,但亦由各地国民党党部领衔举办。据《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中载,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第一条说:“本所定名为中国国民党省立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直属于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所长是当时省党部农民部长陈协五(晚清举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后由俞作柏(桂军高级将领,民主人士)担任。又据《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1925年11月1日(农历9月15日)韦拔群在东兰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取得合法地位,正式命名是“中国国民党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6]

三、农讲所得益于两党领袖人物的实地支持

广州和武昌农讲所之实际主持者是林伯渠、彭湃、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国民党方面,则先有孙中山、廖仲恺(第五任农民部长)的实地指导(广州),后有邓演达、汪精卫的大力支持(武昌)。例如:(1)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应彭湃邀请在第一届农讲所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训词》)中说:“这个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是想要改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7]并亲自布置了毕业学员派往农村后的任务。(2)1926年5月3日,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举行开学典礼,林伯渠主持,毛泽东作开学报告,参加开学典礼的除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共产党代表彭述之外,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教官、后调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陈其瑗、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到会支持。(3)1926年11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同意,经中共中央批准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后,邓演达竭力促成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76次会议作出决定,将筹备中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任主任委员,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8]4月4日,邓演达主持开学典礼,云集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百余人到会祝贺。由于邓演达及武汉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武昌农讲所学员超过广州农讲所的任何一期的学员人数(800多人),短期内为全国17个省区(湘、鄂、赣、浙、皖、直、豫、鲁、陕、晋、奉、闽、川、贵等)培养了大量的农运骨干。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支持农民运动的旗帜是邓演达。在农民运动和创办农讲所上,毛泽东与邓演达的配合默契,堪称国共合作的典范。毛泽东关于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和中心是土地问题,尤其是建立农民武装的理

论在党外之具共识者,首推邓演达。

早在1926年6月23日总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会议上,邓演达就提出过“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观点,并强调“北伐的军事运动,如果不把握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心环节,纵然军事上胜利了,也会落空的。”^{[9][11]}1926年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武汉开幕。邓演达又与毛泽东等联名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获大会通过。1927年3月27日,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上,是邓演达率先提出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提出“农民武装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要求”。^{[9][12]}强调只有各县农民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劣绅。对此,毛泽东曾在延安不无感慨地说过:“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10]

四 农讲所的教育教学由两党干部共同参与

在中共党员实地操办广州和武昌农讲所的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的廖仲恺、陈克文、甘乃光、张眉宣、龚式农等做出了贡献。

一是参与师资队伍:广州和武昌农讲所历届任课的教员约30多人,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如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李立三、周其鉴、谭植棠(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二、三届教员,第四届班主任)、张秋人、安体诚(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赵自选(第六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训练总队长)、丁树德、林伯渠、陈延年、阮啸仙、邓中夏、郭沫若、谭平山、张太雷、方志敏、高语罕、唐澍等。国民党员和民主人士如廖仲恺、何香凝、陈公博、邓植仪(民主人士)甘乃光等也先后担任过农讲所的教员。

二是参与课程建设:广州农讲所和武昌农讲所的课程,除《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地理》等之外,还有《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国民党党纲及宣言》等。国民党人甘乃光、陈克文创办发行的《农民运动》刊物、毛泽东编订的《农民问题丛书》也是农讲所最重

要的课程资源。甘乃光、陈克文为刊物竭尽全力,《农民运动》发刊词即由甘乃光撰写,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彭湃、阮啸仙等先后在《农民运动》刊物上发表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土地和农民》(李大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彭湃)、《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谭平山)。毛泽东编订的《农民问题丛书》亦载入《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等文献,不仅农讲所学员人手一册,并且传播于全国各地。

五 农讲所学员的选送和安排由两党合作承担

广东农讲所创办伊始,其目的是“第一,调查广东大势;第二,派特派员到农村工作。”^[11]学员选送和派遣的主要渠道则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各级国民党党部(该时期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故广州农讲所毕业学员名单都刊载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农民》上,以晓谕各地(第6期的毕业学员名单则没有保留下来)。第一届学员获毕业证者33人(女生2人),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24人)分赴广东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工作。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以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王首道(中共)来自湖南,毕业后是由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12]

国民政府对农讲所的农运特派员派遣工作十分重视。广州农讲所前5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以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分配在广东开展农运活动,广东国民政府提供了经费保证。北伐开始后,革命势力逐步由广东一省扩展到两湖、江西等省。1925年底,农民部为保障特派员在基层的工作,曾特别通过两项决议案:一是《特派员薪金应按月发给并将以前积欠扫数清发以维持生活决议案》,二是《请农民部发给各特派员长期舟车免费证折决议案》。1926年9月,毛泽东曾以广州农讲所负责人身份就第六届毕业学员事宜给国民党农民部陈克文、甘乃光致函,提出解决毕业学员返乡路费不足问题。与此同时,还特别建议已建立省党部的省份,应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在省党部农民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如江西);而在国民党尚未设立

省党部的省份,则建议设立办事处(如云南);对过去工作中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提出来由国民政府及时给予了纠正(如陕西)。^[13]

农讲所始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留下了现代史上的辉煌;终于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也给我们留下了启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的崛起,在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创造了条件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也不能不为之赞叹,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所承认。但是,当农民运动继续深入时,曾经支持过农民运动,参与创办农讲所的国民党终于把这个大革命的成果连同被唤起的民众完全推给了共产党。这首先是因为国民党右派本质上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其次是国民党企图脱离农民自身的斗争和土地革命要求而“唤起民众”的政纲。国民党的政纲规定:由国家制定土地法,由地主将私人所有的土地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14]这样,逐渐使土地为国家控制,而后由国家平分给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15]因此,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一直没有颁布平均土地的法令。对此,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国民党“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普通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党纲是一个旨在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16]

历史告诉我们:民众既是革命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革命的主体。在一个如此博大、一穷二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国家,只有农民命运的不断改变而使之成为革命的主体,才能造就人民共和国。

参考文献:

- [1] 王忠志. 马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路先锋[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1989(4).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 [3] 李君如.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M]. 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7:59-60.
- [4] 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M].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294.
- [5]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纪要要[N]. 民国日报, 1926-03-26.
- [6] 陈天择. 实事求是地研究党的历史[J]. 广西大学学报 1981(1).
- [7] 孙中山.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M]//孙中山全集:第10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8] 李捷, 于俊道. 东方巨人毛泽东[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6:216.
- [9] 丘挺. 邓演达年谱[M]. 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10] 刘继兴. 民国大腕: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211.
- [11] 林祖涵. 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J]. 中国农民, 1926(6-7).
- [12] 王首道. 王首道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8:35.
- [13] 金以林.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泽东两封亲笔信函考证[J]. 党的文献, 2003(3).
- [14] 丁身尊. 广东民国史:下册[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111.
- [15] 孙中山.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M]//孙中山全集:第10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16] [美]费正清.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1923—1928年[M]//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1章.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骆晓会